

影响过一代人的书



DIE WELT VON GESTERN
Erinnerungen eines Europäers

昨日的世界

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奥] 斯蒂芬·茨威格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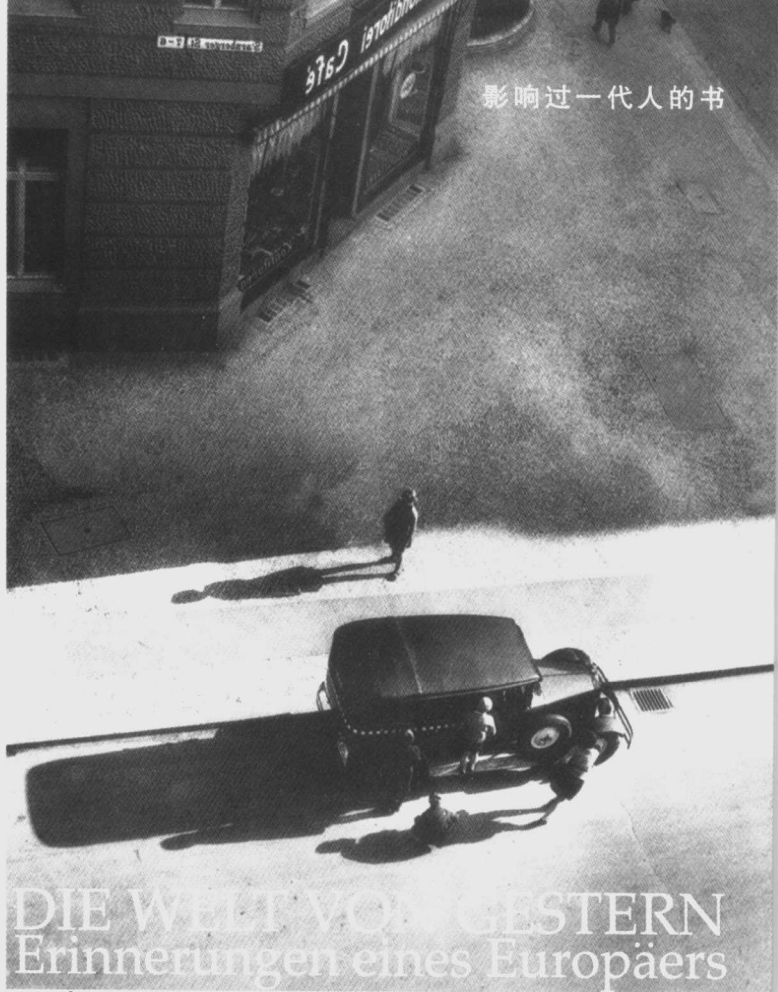
舒昌善 孙龙生 译
刘春华 戴奎生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影响过一代人的书



DIE WELT VON GESTERN
Erinnerungen eines Europäers

昨日的世界

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奥] 斯蒂芬·茨威格 著
舒昌善 孙龙生
刘春华 戴奎生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奥)茨威格
(Zweig, S.)著;舒昌善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5

(影响过一代人的书)

ISBN 7 - 5633 - 4580 - 9

I . 昨… II . ①茨…②舒… III . 茨威格, S.
(1881 ~ 1942) - 回忆录 IV . K835.2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455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 - 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9mm × 1194mm 1/24

印张:15.75 字数:320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8 000 定价: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莎士比亚：《辛白林》

推荐序

雷 颐

伟大的作品中总有某种永不过时的东西，吸引着人们一遍遍重读，从中不断汲取教益，获得价值不菲的启迪，体验一种难得的美的感受。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便是这样一部永不过时之作。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是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出身于富裕的犹太家庭。他在小说、人物传记、短论和诗歌方面均有杰出的成就，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三大师传》、《异端的权利》、《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等。他的小说和传记的特点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深刻细致，洞烛探幽，因此有“心理现实主义大师”、“灵魂的猎手”之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积极反战；1934年他受到纳粹的迫害，流亡国外，1942年在孤寂与理想破灭中与妻子在巴西双双自杀身亡。《昨日的世界》就是他的回忆录。这本书写于1939至1940年间，其时二战正酣，经历过一战期间人类互相厮杀的茨威格目睹人类规模更大、手段也更残酷的再次自相残杀，内心充满痛苦与绝望。两年后，他便在巴西自杀，所以这是他生前最后系统发表的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类的回忆、感受与思考。在他的回忆中，世界大历史的风云变幻与个人在时代大动荡中的悲欢离合浑然一体，因此其中的种种感受更细腻、更亲切，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种种思考更深刻也更引人深思。

对欧洲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昨天”和“今天”的分水岭，对大多数欧洲平民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突如其来、毫无准备的。这样重大的事件事先似乎全无预兆，以至连对时局一向关心、对战争抱有相当警惕的茨威格在大战爆

发前夜还与往常一样，悠哉游哉地前往风光如画、游人如织的比利时海滨度假，并自信地与人打赌说肯定不会打仗，否则“就把我吊死在那根夜灯杆子上”。但言犹在耳，战争却如晴天霹雳般突然爆发，茨威格只得中断度假，匆匆乘火车离开比利时回国，于第二天早上回到维也纳。

但出乎意料的是，这天早晨他发现维也纳的街头此时竟充满了一种节日的气氛。到处是彩带、旗帜、音乐，全城的人此时都开始头脑发昏，处于亢奋状态，对战争的最初恐惧马上就变成了满腔热情。他写道：“说实在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像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正是这种整体感，使他们“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的确，在和平年代“日常生活”机械刻板地日复一日，生活本身似乎就是目的，人们为活着而活着，“普通人”似乎永远都是“普通人”。而战争这类巨大的历史事件使不少人感到枯燥的日常生活突然中断，建功立业不仅“可望”而且“可及”，“普通人”开始成批地成为“英雄”，一大批原来不知名的“小人物”突然成为众人瞩目的叱咤风云之辈。人们感到了一种超越生活、远在生活之上的更为崇高的目的和意义，生活因此而充满激情与浪漫……但茨威格意识到，这种“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如虎添翼的作用”。

使茨威格更感震惊的是，当时的大多数作家也以狂热的言词宣扬对敌国的仇恨和战争，“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面对这种状况，他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向利用当时

群众的热情这种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为反对战争而斗争。“我知道我要反对的敌人——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与死亡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预言家们的廉价的乐观主义。”但这种斗争异常困难,因为谁反对战争“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这一帮子人,他们把谨慎的人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而在他们轻率地招惹来的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手足无措了”。这种貌似“崇高”的“道德优势”不仅为群体的狂热火上浇油,而且使反对者居于“道德劣势”而难以启齿,非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而不敢为。但茨威格明知不可却勇而为之,积极著文反战,还用戏剧的形式描写、肯定在狂热的时刻被认为是软弱的胆小鬼而遭人蔑视的“失败主义者”。不过茨威格马上发现自己被所有的朋友孤立,以致他也常常怀疑究竟是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抑或确是别人聪明自己发疯。

但是,毕竟还有一个伟大的心灵与他一同跳动。罗曼·罗兰在大战爆发前就不断向人们呼吁:“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愈来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卑劣的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战争爆发后,罗曼·罗兰更是积极、勇敢地公开反战。他与茨威格,这两个交战国的伟人走到一起,联合反战,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茨威格写道,正是在罗曼·罗兰身上,他“看到了另一种英雄主义,即那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有道德的英雄主义”。

经过了几年残酷的战争,群众初期的狂热渐渐冷却下来,反战、和平终于成为普遍的情绪和愿望,但人们已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突发重大事件最初的群体性反应,往往是未经深思熟虑因而更多地反映出人性中值得注意的本能、本性。面对汹汹群情,是以“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的东西使之更加狂热(在一些漂亮的言词后很可能“还隐藏着物质利益”,自己其实并不“牺牲”),结果酿成大祸;还是冒大不韪使之更为冷静、理性,努力防止,起码是减轻灾难,是对每一位“智识者”的道德的真正考验。

对手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来说要经受真正的道德考验并不容易。

一战爆发后,绝大多数作家都以狂热的文字鼓吹“为祖国而战”,“他们以为鼓

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在茨威格的周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像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来激励士气，鼓舞冲杀。诗人和剧作家恩斯特·利骚，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利骚是茨威格的熟人，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德国犹太人家庭，是茨威格所认识的最普鲁士化或者说是被普鲁士同化得最彻底的犹太人。对利骚来说，德国文化无与伦比，德国利益至高无上，总之，德国就是一切，他似乎比那些“真正的”德国人更加热爱、信赖德国。

战火乍起，德英宣战，利骚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首名为《憎恨英国》的诗歌，以简单、干脆而富感染力的文字在民众中煽起对英国的强烈仇恨。这首诗就像一枚炸弹扔进了弹药库，激起巨大反响，德国从来没有一首诗像这首诗如此迅速地传遍全国。“各家报纸都转载了那首诗；教师们在学校里把它念给孩子们听。军官们走到前线，把它朗诵给士兵们听，直至每一个士兵能把那仇恨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这还不够。那首小诗被配上乐曲和改编成大合唱，在剧场演出。不久，在七千万德国人中再也没有一个人不从头至尾知道《憎恨英国》那首诗的。”以至德国皇帝都为这首诗中的爱国激情深深感动，授予他一枚红色的雄鹰勋章，以资鼓励。总之，“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红得发紫，享受到一名诗人在那次战争中的最高荣誉”。

但现实其实非常势利，常常会把人狠狠捉弄一番。“战争刚一过去，商人们又想要做生意，政治家们真诚地为促进互相谅解而努力，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抛弃那首要求和英国永远为敌的诗。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大家把可怜的‘仇恨的利骚’斥之为当时鼓吹疯狂的歇斯底里仇恨的唯一罪人。”那些在1914年热情赞美他的人到了1919年却对他避之唯恐不及，“报纸不再发表他的诗作。当他在同伴中间露面时，立刻出现难堪的沉默。后来，这位孤独者被希特勒赶出他全心全意为之献身的德国，并且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是那首诗的悲惨的牺牲品，那首诗曾把他捧得很高，为的是以后把他摔得粉碎”。

在“走出欧洲”这一章中，茨威格回忆了一战前他的印度之行与卡尔·豪斯霍

费尔的相识更发人深省。

在游船上,他遇到的人物形形色色,其中一个正是前往日本出任德国驻日武官的卡尔·豪斯霍费尔。这位军官出身书香门第,博学多识,教养殊佳,用功甚勤,连在游船上也整天忙个不停,用望远镜细致观察每一处地方,还不停地写日记、写报告、查辞典,“一眼就能看出他的非凡的素质和身为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的内在修养”。为了出使日本,他作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学习日语和有关日本、东方的各种知识,以至茨威格还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有关东方的知识。茨威格与他在旅行中成为朋友,回到欧洲后还时有往来。

20年代初,豪斯霍费尔创办了《地理政治学杂志》,茨威格以为地理政治学只不过是会对各民族的个性进行更细致的研究,豪斯霍费尔首先提出的“生存空间”概念也仅是一个中立的学术词语。“我以为这种地理政治学的研究完全有助于各民族互相接近的趋势;说不定豪斯霍费尔的原始意图也确实根本不是政治性的——但我今天不能这样说了。我当时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他的著作(再说,他在自己的书中还引用过我的话呢),而且从未产生过怀疑……没有人指责他,说他的思想是以新的形式为泛德意志的旧要求提出论据,说他的思想是为一种新的强权政治和侵略政策服务。”所以在十余年后希特勒已经掌权的一天,茨威格偶然听说豪氏成为希特勒的密友后震惊万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他实在看不出“一个非常有文化教养、思想渊博的学者和一个以自己最狭隘、最野蛮的思想去理解德意志民族性的疯狂煽动家之间会有什么思想上的直接联系”。但“生存空间”理论事实上确成为纳粹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支柱之一,茨威格写道:“‘生存空间’这一概念终于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露骨的侵略意图提供了一件哲学上的伪装外衣。‘生存空间’这个词,由于它的定义的模糊性,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一个无害的口号,但其产生的后果之一是,它能够为任何一种兼并——即便是那种最最霸道的兼并进行辩解,把它说成是合乎道德和在入种学上是必要的。”所以,“这一事例清楚说明:一种简洁而又内容丰富的表述由于言词的内在力量可转化为行动和灾难……不管自觉不自觉,他的理论把国家社会主义的侵略政策从狭隘的国家范围推广到全球范围,在这一点上,他比希特勒的十分粗暴的顾问们的影响更大”。

或许,豪氏开始是“不自觉”的,但在“生存空间”理论得到希特勒的赏识后却是非常“自觉”的,所以在法西斯垮台后,于1946年自杀身亡。当然,这是茨威格当时所不知道的。

知识分子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制造“言词”,所以这种生产与后果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知识分子难以处理却又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希特勒的出现无疑是人类的巨大不幸,但为什么一个产生过歌德、席勒、贝多芬、康德、黑格尔……的民族,却如此轻易、彻底地被这个几乎没有上过学、一直穷困潦倒、没有正式职业的流浪汉所征服呢?对此,茨威格作了既充满感性又饱含睿智的剖析和沉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各国在物质和精神上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作为战败国,德国的状况更是等而下之,尤其令人失望。德意志帝国于1918年11月崩溃,代之而起的是软弱混乱的魏玛共和国。这时,通货膨胀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一个鸡蛋价钱高达四十亿马克,一根鞋带比从前拥有两千双鞋的豪华商店还贵,修一扇打碎的玻璃窗比以往买整幢房子还要贵,一本书的价钱比从前有几百台机器的印刷厂还要高……马克不断贬值,到1923年11月,一美元竟能兑四十亿马克,而后就数以兆计,马克完全崩溃。高通胀必然带来“高投机”,一些人在各类黑市大发横财,买下城堡和农庄、轮船和汽车,买下整个街道、整座工厂和矿山。结果,造就了一小批扬扬得意的暴发户和成千上万的愤怒的赤贫者,大多数人的终身积蓄化为乌有,社会道德空前败坏。“凡是会识字和能写字的人都做起买卖来,搞投机倒把和想法赚钱,而且心中都感觉到:他们大家都在互相欺骗,同时又被一只为了使国家摆脱自己的负债和义务而蓄意制造这种混乱局面的隐蔽黑手所欺骗。我自信对历史比较熟悉,但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与此类似的疯狂时代,通货膨胀的比例会如此之大,一切价值都变了,不仅在物质方面是如此;国家的法令规定遭到嘲笑;没有一种道德规范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恶渊薮。”这时,全体德国人民对此感到忍无可忍,迫切需要秩序、安定、法律、道德,“谁经历过那些像世界末日似的可怕岁月,都会有这种感觉:当时必然会有一种反弹、一种令人恐怖的反动产生——尽管他对此十分厌恶

和愤恨”。“整个民族都在暗中憎恨这个共和国。这倒不是因为共和国压制了那种放纵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宽了。”为了复仇,“整个一代人都不会忘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时期的那些岁月,他们宁愿重新招回那些大肆屠杀的人”。

与经济崩溃相对应的,是德国国家地位的一落千丈。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必须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将从前侵占的法国、波兰、丹麦、比利时等国的领土归还原主,当德国无力支付赔款时,法国便强占鲁尔工业区相抵,德国军备还受到严格限制,陆军只能有不超过十万的志愿兵,不许有飞机和坦克,不许建造潜水艇和万吨以上的舰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赶到德国抢购,来自异国的穷人在德国却过起了帝王般的生活。所有这些,都强烈地刺伤了素来自负的德国人的自尊心,在广大群众中尤其是军人中激发起强烈的复仇心理和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潮。人们自然又将这种民族屈辱归罪于共和国的软弱无能,转而企盼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或个人来报仇雪耻,复兴民族。

正是这种经济混乱,投机盛行,严重的通货膨胀,高失业率,价值观念崩溃,各种政治危机不断,由民族屈辱导致强烈的仇外情绪……使“当时德国各阶层都迫切要求建立秩序,对他们来说,秩序从来就比自由和权利更重要。歌德就曾说过,没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他厌恶。所以,当时谁要是许诺秩序,一下子便会有几十万人随着他走”。而且从文化传统来说,“德意志人民从来是讲秩序纪律的人民,所以对自己获得自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正急不可耐地巴望着那些来剥夺他们自由的人”。狡诈的希特勒紧紧抓住这一点,以各种蛊惑人心的方式许诺给德意志带来秩序。他的确带来了秩序,带来了一种没有任何个人自由,以机械化、程式化进行大屠杀的秩序。

1933年1月,希特勒在万众欢呼声中上台执政。对于他的危害,甚至某些并不赞同他的德国知识分子也一直注意不够,一些人学究气十足地以“学术性”为标准而对希氏的狂言不屑一顾,以为根本不值得认真看待。而且,“德国的知识分子是最看重学历的,在他们来看,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在啤酒馆里煽风点火的小丑,这使他们上了大当。他们认为,这个小丑绝不会变得非常危险……即使当他在

1933年的1月那一天当上了总理时,竟还有一大批人,甚至连那些把他推上那个位子的人,还只是把他看作是临时占据那个职位的人,把纳粹的统治看作是暂时的插曲”。

历史证明,那种想以“强人”来暂时恢复秩序,而后再归“良政”的想法实际是非常危险的。恶魔一旦出笼,人们就无法控制,此时则悔之晚矣。

而从一战结束到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权这十余年间,也是茨威格创作激情喷泻、最终功成名就的十余年。

这期间,他的书出了一本又一本,而且发行量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如薄薄一册《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就遍及所有学校,印数很快就高达二十五万册;还有一些小说被改编成戏剧或电影。他的作品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据设在日内瓦的“国联”办的《智力合作》杂志统计,他是当时世界上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甚至在外国旅行时他也偶尔会被海关人员认出而享受“免检”的优待,在火车上也曾受到列车员的礼遇……作品的畅销当然还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不仅不必为生计发愁,还可以使他纵情于青年时代的嗜好,大量搜集价格不菲的名人手迹等。

但当1933年希特勒夺取政权后,这一切突然结束。为了“统一思想”、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纯洁性”,希特勒纳粹德国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文化清洗政策以防止“异端邪说”的“污染”。由于他的犹太血统和作品中的反战主义与和平精神,他与其他一些犹太作家的书都被纳粹宣布为禁书。这种禁书措施,纳粹十分狡猾地分步实施,首先是煽动起民众的情绪,以“群众”的名义进行:“对我们著作的第一次攻击,是推给一群不负正式责任的人,即身为纳粹党徒的大学生们去干。在此之前,他们为了贯彻蓄谋已久的抵制犹太人的决定,导演过一出‘民众的愤怒’的丑剧,他们也以同样的方法,暗示那些大学生们,要他们对我们的著作公开表示‘愤慨’。”这些情绪被挑动起来的大学生们成群结伙冲向书店和图书馆,把他们的书搜走,或按中世纪的习惯把这些书钉在耻辱柱上示众,或“把书籍放在大堆的柴薪上,口中念着爱国主义的词句,把它们烧成灰烬,可惜当时已不允许焚烧活人”。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933年5月10日夜晚,一群群兴奋

激动的德国青年学生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煽动指挥下,在柏林市中心的歌剧院广场点燃熊熊烈火,焚烧了包括海涅、马克思、弗洛伊德、茨威格等人作品在内的两万册图书,作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行动”的主要部分。随后,开始了一系列更大规模的焚书活动和对进步思想家的残酷迫害。许多犹太作家、科学家不堪其辱,被迫逃往国外。茨威格写道,他的书曾经以百万计,但此时“谁要是手中还有我的一本书,他就得小心谨慎地把它藏起来,而且我的书在公共图书馆里是始终塞在所谓‘毒品柜’里的,只有得到官方的特别许可——大多是为了辱骂的目的,才有人为了‘学术上’的需要去看那些书籍”。

专制,从本质上说是与人类文明为敌的。

真正的历史总是被轻易忘却,一场巨大的劫难,要不了多久往往就被涂抹成淡淡的粉红色痕迹。或许,正是由于对人类的极度失望,茨威格才在个人已经逃过法西斯的劫难,在远离战火的南美仍可过起宁静舒适的生活的时候,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不让“昨日”的悲剧重演,人类一定要与遗忘抗争,保持对“昨日的世界”的惨痛记忆。

序 言

我从未把我个人看得如此重要，以致醉心于非把自己的生平历史向旁人讲述不可。只是因为在我鼓起勇气开始写这本以我为主角——或者确切地说以我为中心的书以前，所曾发生过的许许多多事，远远超过以往一代人所经历过的事件、灾难和考验。我之所以让自己站到前边，只是作为一个幻灯报告的解说员；是时代提供了画面，我无非是为这些画面作些解释，因此我所讲述的根本不是我的遭遇，而是我们当时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在以往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代人有像我们这样命运多舛。我们中间的每个人，即便是年龄极小和最无足轻重的人，在他心灵深处都曾被我们欧洲大地上几乎无休止的火山般的震撼所激荡过；而我自己知道，在这千千万万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具备像我这样的优越条件：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恰好站在地震最剧烈的地方。那剧烈的地震三次摧毁了我的家园和生活，使我和过去脱离了任何联系，戏剧性的激烈动荡把我抛入一片空虚，把我投入“我不知该奔向何方”——这种我已经十分熟悉的境地。但是，我对这些并不抱怨；因为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会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自由，而且只有和一切不再保持任何联系的人，才不必有任何顾忌。所以，我希望我至少能满足任何一部真实反映时代的作品所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公正和不抱偏见。

由于我脱离了所有的根源，甚至脱离了滋养这些根源的土地——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罕见的。我于1881年诞生在一个强大的帝国，即哈布斯堡皇朝的帝国，不过，在今天的地图上已找不到它：它已经不留痕迹地被抹掉了。我是在维也纳长大的，它是一座具有两千年历史的曾经作为各国首都的城市，然而

在它沦为德国的一座省城以前,我却不得不像一个罪犯似的离开了它。我用我的母语所写的文学作品在那里被焚为灰烬,但正是在那个国家里,成百万的读者把我的书籍视为朋友——这样,我也就不再有任何归属;所到之处,都不过是作为一个陌路人,或者至多是作为一个宾客;即便在我心中选择作为自己故乡的欧洲,自从它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第二次自取灭亡地把自己撕裂得支离破碎以后,也已经在我心中消失。和我自己的意愿相反,我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从未有过像我们这样一代人,道德会从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我指出这一点,绝非出于自豪,而是含着羞耻。在从我开始长出胡须到胡须开始灰白这样短短的时间跨度之内,亦即半个世纪之内所发生的急剧变迁,大大超过平常十代人的时间。而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觉得:变迁未免太多了一点!在我的今天和昨天之间,在我的扶摇直上和节节败落之间,是何等的不同,以致我有时仿佛感到我一生所度过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几种,因为我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当我无意之中提到“我的生活”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我的哪一种生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今天的生活?同样,我也不时觉察到,当我说起“我的家”时,我并不立刻就我知道我指的是从前哪一个家,是在巴特的那个家,还是在萨尔茨堡的那个家?还是在维也纳的我的父母家?或者当我说起“在我们那里”时,我就不得不惶惶然提醒自己:对我故乡的人们来说,我早已不属于他们中间的一员,就像我不属于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一样,我和那里已不再存在有机的联系。而在这里,我又从未完全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我曾经在那里长大成人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世界,在我的心目中显得愈来愈不一样,成了完全不同的世界。每当我在谈话中向年轻的朋友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些事情时,我从他们突兀的问题中发现,有多少事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连我自己今天也不得不对我们当年竟会把如此繁多庞杂的内容压缩在一代人生活的短促时间之内而感到惊异,尤其是当我把那种

生活——诚然,是一种遭到损害和极其难堪的生活——和我的祖先们的生活方式比较时,更是如此。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见到过什么?他们每个人都是以单一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自始至终过的是一种生活,没有平步青云,没有式微衰落,没有动荡,没有危险,是一种只有小小的焦虑和令人察觉不到的渐渐转变的生活,一种用同样的节奏度过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静,是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从生到死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座城市里,甚至几乎总是在同一幢住宅里。至于外面世界上发生的事,仅仅停留在报纸上而已,从未降临到他们的门前。在他们生活的日子里,大概也在什么地方发生过战争,不过用今天的规模来衡量,那只不过是一场小仗,而且是在遥远的边境线上进行,人们听不见隆隆的大炮声,再说半年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了,被人们所忘却,成了枯萎的一页历史。老一套的生活又重新开始。可是我们这一代人过的生活,一切都不会重复,已过去的生活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再也不会回来。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饱尝了以往历史有节制地分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以往,充其量是这一代人经历了革命,下一代人遇到了暴乱,第三代人碰到了战争,第四代人尝到了饥馑,第五代人遭到了国家经济的崩溃——况且,总有一些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根本什么都没有碰上。而我们今天六十岁的这一代人和比我们略微年长一些的一代人,什么事情没有见过?什么事情没有遭受过?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凡是能想像得出的一切灾难,我们都从头至尾一一饱尝过(而且还没有尝尽)。我自己就是人类两次最大战争的同代人,甚至每次是在不同的战线上经历,第一次大战是站在德国这一边,第二次大战是站在反德国这一边。我在战前曾享受过最充分的个人自由,但在战后却尝到了数百年来最大的不自由。我曾被人大肆赞美过,也曾被人无端排斥过;我曾自由过,也曾不自由过;我曾富有过,也曾贫穷过。《约翰启示录》里那几匹苍白的马^①全都闯入过我的生活,那就是革命和饥馑、货币贬值和恐怖统治、时疫疾病和政治流亡。我曾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性思潮——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和蔓

① 分别象征瘟疫、战争、饥馑、死亡,下同。——译者注

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我们欧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义。于是,我也就势必成了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击人类不可想像地倒退到以为早已被人忘却了的野蛮之中,这是一种有它自己纲领性的自觉信条的反对人性的野蛮,使我们在经过了若干世纪之后,重又见到了不宣而战的战争,见到了集中营、严刑拷打、大肆抢劫和对不设防城市的轰炸。所有这一切兽行是我们以前的五十代人所未曾见识过的,也但愿我们的后代人再也不会容忍的。不过,与此自相矛盾的是,我在这个使我们的世界在道德方面倒退了将近一千年的同一时代里,也看到了同样的人类由于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未曾预料到的成就而使自己大大进步,一跃超越了以往几百万年所取得的业绩,且看:用飞机征服了太空;地面上的话可以在同一秒钟之内传遍全球,从而克服了世界的空间距离;原子的裂变战胜了最险恶的潜伏疾病。这些昨天还不可能的事情,如今几乎每天都在重演。总之,在我们之前,作为整体的人类,既没有露出过像我们所见到的那种恶魔般的狰狞面目,也没有建树过那种好像是神明创造的业绩。

我似乎觉得,为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紧张而又富有戏剧性的生活作见证,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因为每个人都是那些巨大转变的见证人,而且是迫不得已的见证人——我再重复一遍。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不存在任何的逃避,不可能像我们先辈那样置身于局外;由于同时性的新机制,我们始终和时代休戚相关。如果炸弹在上海摧毁房屋,在受伤的人尚未被抬出他们的房屋以前,我们在欧洲的自己房间里就已经知道了。发生在一千海里以外大洋那边的事,很快就会印成图片展现在我们面前,犹如亲临其境。面对这种不断的彼此沟通和介入,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保险地方了。没有一块可以逃遁的土地,没有一种可以用钱买到的安宁。命运之手随时随地会把我们攫住,把我们拽到它的永不知足的戏弄之中。

再说,一个人必须始终服从国家的要求,让自己去当最最愚蠢的政治牺牲品,让自己去适应最最离奇的变化,使自己永远和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尽管他竭力抵抗,共同的命运还是不可抗拒地把他卷进去。一个从头至尾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或者确切地说,一个被驱赶着、追逐着——我们很少有喘息的机会——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就会比自己的任何一个祖先具有更多的阅历。况且,